

大理国南诏
雕刻绘画艺术

26.3299
L196
0036478

美术全集

云南民族

李昆声 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南诏大理国 雕刻绘画艺术



003647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诏大理国雕刻绘画艺术 / 李昆声主编 ; 一昆明 : 云南美术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11 (云南民族美术全集; 3)

I. 南... II. 李... III. ①雕塑-美术考古-南诏-图集②雕塑-美术考古-大理(古族名)-图集③绘画-美术考古-南诏-图集④绘画-美术考古-大理(古族名)-图集 IV. K87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4816 号

责任编辑 彭 晓 王玉辉 张文璞

摄影编辑 张 刘 唐世龙

装帧设计 彭 晓 张文璞 王玉辉 向云波

责任校对 杨 斌

南诏大理国雕刻绘画艺术

李昆声 主编

出版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美术出版社

制 版 深圳兴裕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7 1 / 16
印 张 20
印 数 1-3000
版 次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586-597-3/J·361

定 价 350 元

版 权 所 有 · 翻 版 必 究

云南民族美术全集

总 顾 问

王天玺 尹 俊 梁公卿

顾 问

贺全礼 贺光曙 胡廷武 徐发苍 王晋元 李忠翔 姚仲华

总 监 制

贺全礼

监 制

程志方 周文林 欧阳常贵 方绍忠

主 编

李昆声

副 主 编

彭 晓 程志方 张永康

南诏大理国雕刻绘画艺术

顾 问

熊正益 李映德 杨宴君

主 编

李昆声

副 主 编

彭 晓 张永康 张 立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方绍忠 王海涛 邓启耀 李昆声 陈 琦 杨政业
杨德聪 杨德望 张 立 张 刘 张 楠 张永康
周文林 欧阳常贵 赵丁丁 唐世龙 黄德荣 彭 晓
程志方 谢道辛 董增旭

撰 文

李昆声 邓启耀 张永康 黄德荣 王海涛 董增旭
杨德望 彭 晓

摄 影

(以姓氏笔划为序)

邓启耀 田正清 李维江 邢 毅 张 刘
唐世龙 徐建德 徐 冶 彭 晓 熊美亮

英文翻译

杨德聪

英文审校

解炳昆

目 录

CONTENTS

序 言 李昆声 (3-13)

南诏大理国造型艺术寻访 邓启耀 (16-27)

Preface by Li kunsheng (14-15)

A Survey of the Shaping Art of Nanzhao and Dali Kingdoms by Deng Qiyao (28-29)

雕 刻 (30-171)

巍山佛教造像 (34-47) 安宁王仁求墓碑石刻 (48-49) 剑川石钟山石窟 (50-125) 安宁法华寺石窟 (126-133) 昆明地藏寺大理国经幢 (134-149) 西昌凉山博什瓦黑摩崖石刻 (150-163) 大理挖色石窟 (164-167) 剑川金华山摩崖石刻 (168) 大理喜洲归源寺镇国灵君天神像 (169) 禄劝三台山摩崖石刻 (170-171)

SCULPTURE (30-171)

Stone Sculptures from Longyitu Site of Weishan County (34-47) Stone carvings of Wang Renqiu's Tomb in Anning County (48-49) Shizhongshan Grottoes in Jianchuan County (50-125) Grottoes in Fahuasi Temple of Anning County (126-133) The Stone Pillar in Dizang Temple of Kunming (134-149) Stone Images at Boshiwahei in Xichang Liangshan (150-163) Stone Images at Wase of Dali (164-167) Stone Images on Mount Jinhua of Jianchuan County (168) Image of Heavenly Guardian in Guiyuan Temple of Dali Xizhou (169) Midala Stone Images in Luquan County (170-171)

绘 画 (172-241)

剑川石钟山石窟露天崖画 (175-181) 《南诏图传》 (182-193) 《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 (194-239) 祥云水目寺塔壁画《群佛法会图》 (240) 大理国经卷《维摩诘会图》 (241)

PAINTING (170-241)

Cliff Painting on Mount Shizhongshan of Jianchuan County (175-181) History of Nanzhao Kingdom in Pictures (182-193) Buddhist Scroll Painting by Zhang Shengwen of Song Dynasty (194-239) Mural on the Pagoda in Shuimu Temple of Xiangyun County (240) "Weimoji Meeting" (241)

文 物 (242-2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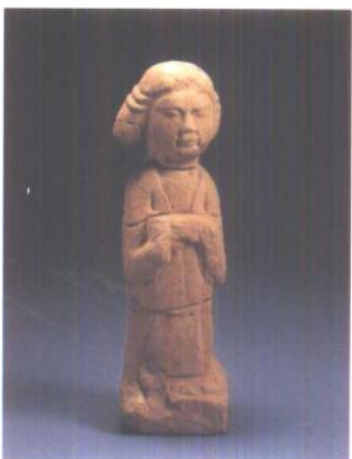
唐俑 (246-247) 观音造像 (248-255) 佛陀造像 (256-263) 金刚、罗汉造像 (264-270) 供养塔、法器、动物造像 (271-277) 陶瓦、陶罐、板俑 (278-281)

CULTURAL RELICS (242-281)

Stone Sculpture of Tang Dynasty (246-247) Sculptures of Guanyin (248-255) Sculptures of Buddha (256-263) Sculptures of Vakra (264-270) Buddhist Objects and Sculptures of Animal (271-277) Pottery Jars and Plaque-Shaped Figurine (278-281)

图版目录 (282-311)

PICTURE CATALOGUE (282-311)



从点苍山俯视大理市，在崇圣寺
三塔一带就是南诏、大理国建都时的
阳苴咩城遗址。





夕阳斜照下的洱海湖畔。以此为中心
向全滇、川南及黔西辐射的广大地区，曾是
南诏、大理国地方政权的属地。



序 言

李昆声

云南省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这本画册的宗旨是介绍古代南诏和大理国时期的优秀美术作品。鉴于一些读者对古代南诏和大理国不一定十分了解，我们先将这两个地方政权的历史作一简要介绍，以便读者能大致知道这些艺术佳作赖以产生的时代背景，加深对内容的理解。

南诏(公元738年-902年)，是唐代在我国西南边疆崛起的一个以彝族(乌蛮)和白族(白蛮)先民为主体、以洱海地区为中心而建立的地方民族政权。

南诏的“诏”字，《新唐书·南诏传》解释为“夷语王为诏”——这里所谓的“夷语”，就是古代氏羌族系的语言。在《晋书·苻坚载记》中有“(苻)坚强盛之时，国有童谣云‘河水清复清，符诏死新城’”的说法(苻坚是氏羌族人，公元4世纪时的前秦国王)。氏族语把“王”称为“诏”，而南诏也是古代氏羌族系后裔建立的国家。在南诏，“诏”也是王或首领的同义词，因此，“南诏”的意思在汉语里就是“南王国”。

大理国(公元938年-1254年)，是继南诏之后建立的以白族(白蛮)先民为主体的地方民族政权，其疆域与南诏大体相近。

南诏、大理国相继立国500余年，时代大体与唐、五代和宋朝相始终。

南诏、大理国在中国古代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中国西南民族史中占有显著的地位。

(一)

唐朝初期，在云南洱海地区分布着六个大部落，史称“六诏”：

施浪诏，在今洱源县和邓川之间，首领施望欠，部众数万人。

浪穹诏，在今洱源县，首领丰时、丰苴兄弟。丰时之孙铎罗望在南诏统一洱海地区之前曾任浪穹州刺史。

邓赕诏，在今洱源县邓川镇。浪穹诏首领咩罗皮曾任邓赕州刺史。

以上三诏位置相邻，合称“三浪诏”。

越析诏，又称磨些诏，在今宾川县，以产利剑“铎

鞘”闻名。这种古兵器现已失传，它的形状在《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第二图上可以看到：此图中有七位人物，其中一位是捧壶童子、一位是持旗执盾武将、一位为架鹰官员，另有几位武将随侍国王；最右边一位武将手持长兵器，刃部呈锯齿状，符合唐代人樊载在《蛮书》上描述的“铎鞘”形状——“刀戟残刃”，这件兵器柄部用黄金装饰，极其名贵，就是越析诏生产的“铎鞘”。

蒙雋诏，在今漾濞县和巍山县北部，是六诏中最大的一诏，与蒙舍诏相邻，首领是雋辅首。

蒙舍诏，在今巍山县南部，与蒙雋诏同在一个盆地中，因其地处其他五诏之南，又称“南诏”，始祖是蒙舍龙。

以上六诏中，除越析诏以外，其余五诏首领皆为“乌蛮”，他们是现代彝族的先民。越析诏的居民“磨些蛮”，则是现代纳西族的先民。

六诏以外，还有一些小诏，如石桥诏、石和诏、白崖(诏)、剑川(诏)等等。

此外，在洱海周围还居住着“西洱河蛮”，他们是现代白族的先民。

在以上这些大大小小的部落中，蒙舍诏经过大首领细奴逻及其后代逻盛、盛逻皮、皮逻阁四代人的创业历程，先统一了洱海地区，最终统一了云南。

蒙舍诏统一云南的过程，在南诏末代王舜化贞中兴二年(唐昭宗光化二年、公元899年)的绘画长卷《南诏图传》中，是通过“巍山起因”、“祭铁柱”和“西洱河记”三件大事来描绘南诏历史的。《南诏图传》中很多内容已得到云南古代文献的印证。

蒙舍诏开山鼻祖的形象，至今在剑川石钟山石窟中仍能见到。在石钟山石窟狮子关区的第九号窟《细奴逻全家福》石刻造像正中端坐一对男女，他们之间有题记四行：“大圣瞢罗(一行)大王及后妃男女(二行)从者等尊容元(三行)改造像昌宁记之(四行)。”“瞢罗”就是“圣独罗”的异写，也就是“细奴逻”。由此可知，正中石刻男造像为南诏始祖细奴逻的尊容，女造像为王妃。

蒙舍诏经过细奴逻祖孙四代人的苦心经营，到皮逻阁统一洱海地区后，唐王朝便正式予以承认。唐开元二十



1. 大理古城遗址——阳苴咩城。远处白雪皑皑的点苍山，是南诏、大理国首府的屏障。
2. 湛蓝的高原明珠——洱海，湖水中蕴藏着数千年的历史和无数神奇的故事。
3. 大理崇圣寺三塔，历经数次地震而依然巍峨屹立。主塔造型与西安小雁塔相似，是典型的唐塔风格。



六年(公元738年),唐朝廷封皮逻阁为云南王、越国公,赐名蒙归义——史学界把这一年定为南诏正式建国时间。南诏建国次年(公元739年),南诏王皮逻阁迁都太和城(在今大理市);公元762年,皮逻阁之子阁逻凤征服滇西德宏地区;公元765年,阁逻凤令其子凤迦异建拓东城(今昆明市),并以“二王”的身份坐镇、统治滇池地区。

南诏在阁逻凤统治时期(公元748年—779年)处于鼎盛阶段,其势力不断东扩,直抵滇东爨区(今云南曲靖地区),与唐王朝产生直接冲突,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天宝战争”,以南诏取胜而告终。尔后,南诏又一度与吐蕃结盟,势力逐渐强盛。南诏王阁逻凤的尊容在剑川石钟山石窟第二号窟《阁逻凤议政图》中可以见到:此窟共雕16人,是整座石窟群中雕刻人像最多的一窟;整窟雕成一座华贵的殿堂,阁逻凤端坐正中龙椅之上;两侧有握剑、执旗、执扇等人物,窟门口对坐着相当于宰相之职的清平官——这些庄严肃穆的场景和阁逻凤八面威风的神态正反映出南诏当时鼎盛的国力。据《新唐书》记载,南诏强盛时期的疆域是“东距爨(今滇东),东南属交趾(今越南北部),西摩伽陀(今印度),西北与吐蕃(今西藏)接,南女王(今泰国北部),西南骠(今缅甸),北抵益州(今川南、滇北),东北际黔、巫(今贵州西南部)”。

“天宝战争”数十年后,南诏王异牟寻又重新归附唐王朝。唐与南诏会盟于大理点苍山,并于贞元十年(公元794年)正式册封异牟寻并赐金印。异牟寻这位“颇知书”、“有智数、善抚众”的南诏王,在剑川石钟山石窟第一号窟中也有他的造像:此窟名为《异牟寻坐朝图》,共雕石刻造像九人,中坐者为南诏王异牟寻,两侧对坐着在南诏担任清平官的内地汉人郑回和杜光庭。

唐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异牟寻去世,南诏国开始走向衰落。延至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南诏王舜化贞死,权臣郑买嗣发动宫廷政变,杀死舜化贞之子,南诏灭亡。至此,以白蛮(白族先民)为首领的大理地方政权开始走上了历史舞台。

(二)

公元903年,郑氏建立的政权国号为大长和国,于公元927年灭亡。

公元928年赵善政灭大长和国后,建大天兴国。

公元930年杨干贞废赵自立为王,建大义宁国。

这些频繁的王权更迭、政治动荡、经济混乱引起人民的不满。此时,一位杰出的白蛮人士段思平在洱海地区发动人民反对大义宁国杨氏政权,得到广泛的拥护与

支持。段思平出身于贵族世家(今大理市阁洞塘村人),系南诏大将军的后裔,幼年时他家境衰败、生活贫困而放牧山中,后因战功卓著而出任通海节度使。据《南诏源流纪要》载:段思平得到人民的拥戴,“凡牧牛、牧马及鸡鸣、犬吠等处皆云段思平将为王”。

公元938年,段思平发动洱海地区民众,并联合滇中“三十七部”部族起义,推翻杨氏大义宁国,建立了长达300余年的大理国。

段氏建立大理国之初,在洱海地区及滇中“三十七部”各民族中实行减岁粮、免徭役等一系列措施,巩固了新兴的封建地方政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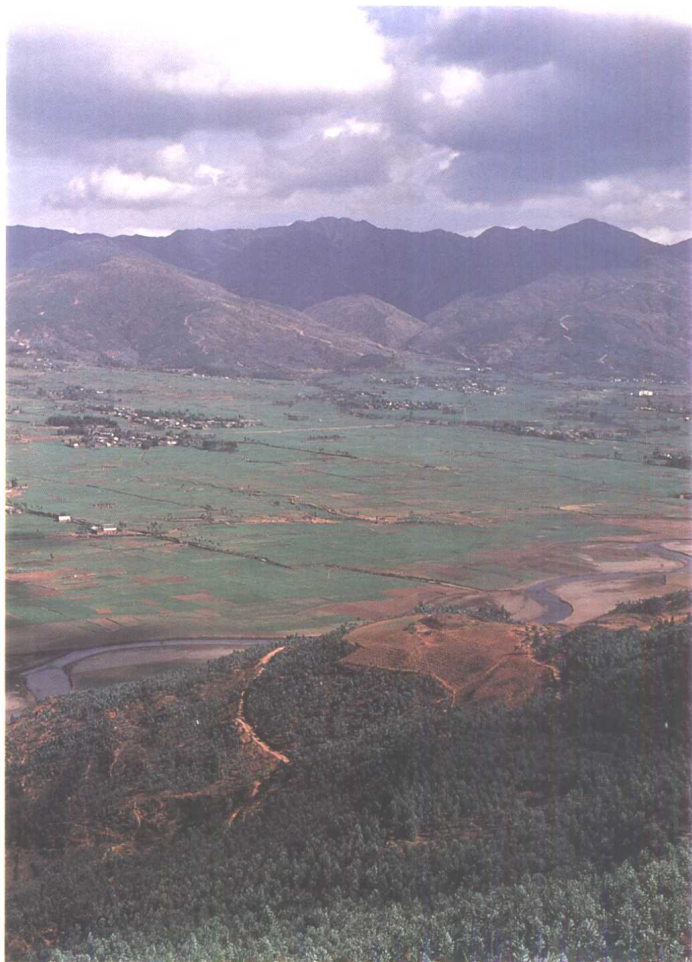
段思平去世后,其子段思英继任大理国王,一年后被迫避位出家为僧,由其叔段思良任国王,其后大理国以段思良一脉直系传位。宋王朝在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7年—984年)曾封段思良之孙、大理国王段素顺为“云南八国都王”;淳化年间(公元990年—994年),宋王朝册封大理国王段素英为“云南大理国主、统辖大渡河南姚州界山前山后百蛮三十六鬼主、兼怀化大将军、忠顺王”和“检校太保、归德大将军”;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宋王朝册封大理国王段正严(又名段和誉)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

大理国与中原宋王朝在政治上是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的臣属关系。在军事上,大理国从未进犯过宋王朝,即便南宋偏安江南一隅之时也是如此。在经济文化上,大理国与宋王朝更有着密切的联系。

大理国与宋王朝的通商贸易往来较为频繁。出售给内地的商品主要有药材、麝香、胡羊、长鸣鸡、象皮胄、大理刀、披毡等,贸易数额最大的是马匹。由于南宋朝廷抗金战争的需要,在邕州(今广西南宁)设马司互市,每年最多时向大理国购买3500匹良马。大理国的良骏运往邕州的路线自阳苴咩城(今大理市),经鄯阐(今昆明市),石城(今曲靖市)、自杞(今贵州兴义市)而到邕州(今广西南宁市)。这些良马称“蛮马”、“大理马”,多数训练成为战马,供宋朝骑兵使用。

大理国存在的时期,基本上与宋朝相始终。从公元938年段思平建大理国起,共有22位国王在位。公元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率十万蒙古铁骑南下,经甘肃、宁夏、四川入滇,破阳苴咩城。翌年,蒙古军破鄯阐城(今昆明市),俘大理国王段兴智,大理国自此灭亡。

从以上对南诏、大理国的扼要介绍可以看出:南诏史实际上就是唐代云南地方史,大理国史就是宋代云南地方史;南诏、大理国的艺术史,就是唐宋500年间云南的地方艺术史。



1. 大理古城——南诏、大理国长达 500 多年的首府。
2. 龙尾关——南诏、大理国的军事要塞之一。
3. 安宁法华寺石窟，曾是大理国时期滇中佛教圣地。
4. 雅砻江——南诏的北疆界河，位于今四川省西昌地区。
5. 巍山巍山——南诏第一个王都巍山城就建在这座山上。

1	5
2	
3	
4	

(三)

这里,将简要介绍一下南诏、大理国艺术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

首先,佛教艺术在南诏、大理国艺术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东方国家有着广泛的影响,在我国也有二千余年的历史,因此,佛教文化和艺术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南诏、大理国,佛教文化艺术实际上是处于核心和主导地位。这两个云南地方政权在史书中又有“佛国”、“妙香国”的盛誉:南诏时期,曾有“建大寺八百,谓之‘兰若’、小寺三千,谓之‘伽蓝’”的记载,并且王室还要求家家户户“以敬佛为首务”(《梵古通记浅述》);到大理国开国伊始,国王段思平就“岁岁造寺,铸佛万尊”;至大理国亡时,云南仍是“家无贫富,皆有佛堂……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殫记”(元郭松年《大理行记》)。

佛教艺术最显著的地面标志物是塔、幢、石窟、寺庙。

塔作为佛教建筑物,起源于印度,梵语称“萃堵波”,最初是存放释迦牟尼的佛骨舍利子的建筑物,大约在公元1世纪传入我国。

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佛教鼎盛,兴建了一大批建筑精美、气势恢宏的佛塔。至今还屹立在云南39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南诏、大理国佛塔有:大理崇圣寺三塔、弘圣寺塔、佛图塔,昆明东寺塔、西寺塔,大姚白塔,祥云水目寺塔等。

幢也是从印度传入我国的佛教建筑物,是佛教寺院中的建筑小品,梵名“驮缚若”、“计都”,汉文译为“幢”或“经幢”。幢最初只是一根立竿,上面覆以彩帛、垂幔、丝绸伞盖等物,表示佛统率众生制伏邪魔之意。后来,发展为雕刻着佛像、菩萨和经咒、经文的石幢。

我国从唐代开始出现石质经幢,云南最有名的石幢是大理国时期的郛阐城(今昆明市)地藏寺经幢。地藏寺原址在今昆明市拓东路金汁河畔,早年废圯,大理国经幢现存于昆明市博物馆内。石幢上共雕300余躯各种造像,一眼望去,整座石幢遍体雕刻,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由于其历史价值、文物价值和科学价值极高,该经幢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教授在《新纂云南通志》中对此幢的艺术价值有极高的评语:“雕刻佛像最精,世人咸为惊异,滇中艺术,此其极品。”

石窟寺艺术也是发源于印度。“石窟寺”是指在岩石上开凿出来的寺庙和僧舍,与一般意义上的平地建

寺庙不同。石窟寺最初是释迦牟尼及其弟子们坐禅的“石室”,后逐渐成为佛教信徒传经弘法的重要场所。

石窟寺艺术传入中国后,几乎遍布神州大地,著名的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大足石窟在中国艺术史中放射出耀眼的光辉。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剑川石钟山石窟、安宁法华寺石窟及一批摩崖造像,也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高超的艺术造型而名闻遐迩。

由于佛教是偶像崇拜的宗教,供奉偶像的寺庙就成为佛教艺术最重要的标志物。然而,云南所有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佛寺庙宇现均无遗存。在这本画册中,我们将介绍云南考古发掘的唯一一座南诏寺庙的遗址——巍山县巍山图山佛教寺庙遗址及其佛教造像等艺术珍品。

(四)

南诏、大理国佛教艺术在绘画艺术上的最高成就,当推《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以下简称《张胜温画卷》)。这件稀世珍宝全长1636.5厘米、高30.4厘米,是一幅纸本、设色、贴金的巨幅画卷,作者是大理国画家张胜温和他的弟子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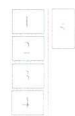
这幅作品刚一问世,就得到历代人士的关注与好评。当时的僧人妙光对画作的评语是“妙出于手,灵显于心”,释宗泐的评语是“绘事工致,诚佳画也”,释豫章的评语是“设色精致,金碧灿然”,明初洪武年间的翰林院大学士宋濂的评语是“施色涂金、皆极精致”——显然,这些都是目睹过画卷之人。

200多年前,这件稀世珍宝作为清朝宫廷的典藏,当时画卷的主人乾隆皇帝是十分钟爱的。原因并不复杂,首先是“物以稀为贵”,乾隆评论说:“……大理国画,世不经见,历代画谱亦罕有称。”其次,画卷创作时间距乾隆时已达600年以上,对他来说也是“古董”了。所以,乾隆又说:“……旧画流传若此,信可宝贵。”乾隆皇帝对这幅画卷总的评价是:“……顾卷中诸像、相好庄严、傅色涂金,并极精彩。”乾隆皇帝是位眼光颇高的艺术鉴赏家,他所过目的历代名画可谓车载斗量,对此画卷有如此评语,足见画卷艺术价值之高。

《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现典藏在台湾故宫博物院。画家出身的民族学家李霖灿教授供职台湾故宫博物院多年,并曾任副院长之职,李教授不仅有条件仔细观摩、研究画卷,而且,还出版了《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一书,全面介绍了这幅佳作。他指出,这幅画卷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件金玉瑰宝”,对张胜温这位公元12世纪的伟大艺术家佩服得五体投地,在“顶礼膜



1. 古朴的大理白族民居，这些村落大多都是依山傍水而建。
2. 漾濞县古道上的铁索桥，曾经是南诏、大理国与缅甸、印度通商古道的必经之地。
3. 暮色中的洱海渔村。渔村对面的小岛，就是南诏、大理国君主们的避暑盛地——金梭岛。
4. 烟波浩淼的昆明滇池，北岸地区曾经是南诏、大理国的东都拓东城和郛闾城的遗址。
5. 立于弥渡县的唐代铁柱——凝聚着南诏历史和文化的象征物。



拜之余,真不敢再赞一辞”,并指出张胜温的画风和吴道子、武宗元等内地大画家的艺术风格有血脉相连的继承关系。由于《张胜温画卷》集佛像、人物、动物、山水于一卷而又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这幅画卷在云南美术史中占有极其崇高的地位。因此,可以说张胜温是云南历史上成就最大、造诣最高、影响最广的卓越画家。

这一时期的另一幅绘画杰作是《南诏图传》,是由画卷和文字卷组成的一幅长卷,内容为叙述南诏的历史。原作始于南诏中兴二年(公元899年),到大理国文经元年(公元945年)又重新临摹,并加上了大理国王(文武皇帝)的画像。《南诏图传》原作已失传,现收藏于日本京都有邻馆内的是《南诏图传》的摹本,按海伦·查平博士和李霖灿教授的意见,此摹本约绘于公元12—13世纪之间。

除以上两部杰作外,还有一些散布于大理地区各庙宇、石窟、经卷中的绘画作品也堪称珍品,如现收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大理国经卷《维摩诘经》中的《维摩诘会图》、剑川石钟寺露天崖壁画《菩萨图》、祥云水目寺塔体壁画《群佛法会图》等等。虽然绝大多数绘画随着庙宇的倒塌废弃而未能流传至今,但我们仍能作为为数不多的杰作中窥视到当年佛教绘画灿烂的风采。

(五)

南诏、大理国艺术最重要的特点,还在于它的地方民族特色。

谈到这个特色,不能不首先谈佛教密宗与“滇密”。

密宗是佛教中的一个分支,又称秘密教、密教、真言宗等,公元7世纪起源于印度德干高原,是由毗卢遮那(大日佛和法身佛)直接传授的秘奥大法,以承传真言、密咒为特征,盛行祭祀。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年—741年),天竺(今印度)高僧善无畏从西域到长安(今西安)传授以胎藏界为主的密法。另一位天竺密教高僧金刚智经南海和广州到长安,其弟子不空也经陆路到长安,师徒俩传授以金刚界为主的密法。上述三位密教高僧在中国佛教史上称“开元三大士”,学术界称上述公元8世纪由印度传入中土的佛教密宗为“华密”(意为华夏密宗)。

也在公元8世纪,天竺高僧莲花生将印度密教传入吐蕃(今西藏),经与当地苯教结合后成为藏传佛教,佛教史上称之为“藏密”。到公元9世纪时,日本僧人最澄到唐朝学习密宗,回国后在日本创立天台宗,称“台密”。而另外一位日本僧人空海也同时入唐学法,回日本后创立密教真言宗,又称“东密”。

我在几年前出版的《云南艺术史》中曾提出,云南佛

教史上的密宗为“滇密”,是与佛教史上的“华密”、“藏密”、“台密”、“东密”不同的一支佛教派别。

“滇密”的创始人是印度僧人、“西天摩伽陀国僧”赞陀崛多。他于南诏“丰祐保和十六年”即公元839年前进入云南并被尊为国师,又娶了南诏王劝丰祐之妹越英为妻。僧人娶妻,按“滇密”教规是正常的,康熙《大理府志》就载有“阿叱力,其业头陀而有家室”(阿叱力为“滇密”的传教士)。著名的崇圣寺千寻塔正是建造于劝丰祐时期(公元824年—859年),这不知是巧合还是赞陀崛多大师的倡议?

南诏、大理国艺术中的地方民族特色,还体现在“滇密”的最主要神祇——阿嵯耶观音上。在《南诏图传》画卷之第六化上就出现“化为阿嵯耶像”一语,在文字卷上也有“吾西域莲花部尊阿嵯耶观音”等语。阿嵯耶观音在南诏和大理国的至高无上地位,从云南两幅著名画卷到浩瀚的地方典籍记载中比比皆是,目前已知的此类造像在全世界有16尊。最早研究和推崇阿嵯耶观音造像者,当推半个世纪之前的美国学者海伦·查平博士,她把收藏于美国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中的一尊大理国王段政兴铸造的阿嵯耶观音像称为“云南福星”。

通过保罗·吉特(Paul·Jete)对海外各博物馆典藏的阿嵯耶观音像的金属成分检测,结论是铸造这些观音像的合金主要是含砷的铜,此外还含锡、锌、铝、银、铁、镍等微量元素,而含砷的青铜合金在公元12世纪以后的世界古代文明地区是很罕见的。现代科学检测手段说明,云南的青铜阿嵯耶观音造像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青铜造像都不相同,甚至无法仿造。观察和测量阿嵯耶观音造像后可以确认,这些青铜阿嵯耶观音造像是严格按照统一的式样来铸造的——风格、手印相同,尺寸大小悬殊也不太大。例如,每尊阿嵯耶观音均为男像,头顶后面的头发均为右侧10绺、左侧11绺,每尊像的手印都是安慰摄取印。但由于每尊造像的尺寸都不相同,说明每尊造像都是一尊一尊铸造的,而不是成批生产的。再从造像工艺之精湛,形象之优美,有的还髹漆、鎏金等现象来分析,可以判明,对阿嵯耶观音像的制作权是牢牢掌握在官府、甚至王室手中,是王室或官家作坊的高水准作品。很久以前我就指出,阿嵯耶观音造像从体质特征上看与现代白族相似,反映了这些造像出自古代白蛮匠师之手,这正是阿嵯耶观音造像的地方民族特色之一。

“滇密”的地方民族特色,还反映在对大黑天神的供奉上。大黑天神是梵语“摩诃迦逻”的意译,准确翻译是大黑天,又称大自在天、湿婆,是“滇密”的主要神祇。大黑天神进入云南的时间可能比阿嵯耶观音和“滇密”始



1. 人山人海的石宝山对歌会 过去的歌会，是白族青年男女通过对歌来选择配偶的主要场所
2. 热闹的白族迎亲队伍，许多古老的习俗依然盛行不衰
3. 白族盛大的“火把节”夜景 相传白族“火把节”是为了纪念在“火烧松明楼”中为大殉难的白洁公主而举行的，这个动人的传说和节日流传至今
4. 一年一度的大理“三月街”盛况 在交通不便的南诏、大理国时期，与外界的贸易交往就是通过“三月街”进行的



祖赞陀崛多要早,约在公元8世纪初。大黑天神一传入云南并“入乡随俗”进入寺庙后,就成为当地群众顶礼膜拜的“土主”偶像。在若干年前的文物普查中发现,“滇池周围132座土主庙中有130座供奉大黑天神”(王海涛《南诏佛教文化的源与流》)。大黑天神在南诏、大理国时期的本土化,也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地方民族特色。

此外,在佛教造型为主的剑川石钟山石窟中还出现了世俗的国王、巫师、清平官等人的雕像。尤其是第九号窟《细奴逻全家福》石雕造像,完全按照白族“本主庙”供奉的本主位置排列,脱离了佛教石窟寺造像的本来宗旨,这是南诏、大理国艺术之地方民族特色的又一典型事例。

(六)

南诏、大理国艺术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她的开放性、兼容性和多样性。

云南位于中南半岛的基部,在唐宋时期,南诏、大理国地处唐宋帝国的西南边疆和东南亚诸国的北部。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其便于吸收祖国内地的传统文化艺术又易于汲取东南亚、南亚各国的域外文化艺术。再者,由于南诏、大理国民族众多,必然要融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其多样化、多元性的自然形成是不言而喻的。云南境内的怒江、澜沧江两条大河自北向南湍急而下,流入缅甸、老挝、柬埔寨、泰国。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我国西北、西南地区的古代民族就沿着这两条河谷通道与东南亚古代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从内地入滇,自秦代以来从四川入滇就有从宜宾到曲靖的“僰道”和从雅安到晋宁的“青衣路”,在《蛮书》中称“南路”和“北路”。经昆明、楚雄、大理、保山、腾冲入缅抵印,亦称“缅甸道”。

这样的地理位置和交通,决定了南诏、大理国的文化艺术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是兼容的而不是排他的,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

对南诏、大理国文化艺术影响最大的当属内地的中原文化,这从《张胜温画卷》中的吴道子、武宗元画风到剑川石钟山石窟人物造像中袍服线条褶皱的“曹衣出水”的典型唐画风格,以及供养人面庞、体态的敦煌壁画风格即可见一斑。雄伟壮观的大理崇圣寺千寻塔的典型唐塔造型风格,更是中原文化在南诏传播的见证。

从剑川石钟山石窟雕像中传递出来的大量信息证明了南诏、大理国艺术的兼容性和多样性。石钟山石窟群位于现白族聚居区之腹地,是古代白蛮(白族先民)创

造的石刻艺术宝库。从若干题记中的施主、供养人的姓名和居所名称可判明为白蛮,从石窟中诸多男性造像的英武剽悍的体质特征也可知其为白蛮。石钟山石窟所在地的剑川县,是南诏、大理国的北疆门户,也是与吐蕃(今西藏)交流的必由之路,石窟中的藏文题记、八大明王石雕(藏密保护神)亦散发出古代藏族文化的气息。第十一号窟的“毕摩”(彝族巫师)造像和第九号窟《细奴逻全家福》中的男女“毕摩”及其道具“屋透”(卦筒)、“切克”(羽扇)等,生动地展现了古代乌蛮(彝族先民)的文化风貌。第十号窟的梵僧造像,则是中印文化交流的结晶。

在南诏、大理国的造型艺术中,最优美的一尊纯金阿嵯耶观音造像,其体质特征接近现代白族,而衣饰风格却来自遥远的南亚孟加拉之古代帕拉帝国。

最后,让我们再回到宗教的话题。虽然佛教密宗在南诏、大理国占主导地位,但并不排斥其他宗教。在著名的南诏《德化碑》上刻有“开三教、宾四门”,说明南诏并不排斥儒教和道教以及其他宗教,《南诏野史》上甚至还记载了南诏王盛逻皮在“开元十四年立文庙”之事。在佛教内部,滇密也不排斥其他流派,如安宁法华寺石窟就是显宗佛教造像的风格。

南诏、大理国的艺术是中华民族古代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支奇葩,是云南少数民族先民们众手浇灌出来的艺术之花!

1998年10月于昆明